

# 铁马金戈正乾坤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抗战文学的回顾与反思 □丁晓平



卢沟桥抗战(版画) 胡一川作

以爱国主义、英雄主义为主题价值,以血性张扬、人性关怀为叙事伦理,以民族苦难、战斗精神为精神追求,以铁血情怀、钢铁旋律为阅读取向的抗日战争题材文学作品(以下简称“抗战文学”),始终在整个文学领域独树一帜、独领风骚,赢得了读者的喜欢和社会各界的肯定。改革开放40多年来,抗战文学不仅在诗歌、散文、小说、报告文学等各个文学体裁上呈现出了繁花似锦的繁荣景象,而且在有关抗战的政治、经济、外交、文化和百姓生活等各个领域也呈现出了百花齐放的格局。

抗日战争是一座文学富矿。改革开放以来,无论是虚构类作品还是非虚构类作品,在主题、结构的创造性、丰富性上,抗战文学改变了过往单一扁平的叙事模式和人物塑造,摒弃了过去逼仄的情节设置,抛却了狭隘的创作空间,挣脱了意识形态的束缚,更多地采取了多维、多元、多彩、多面的立体呈现,拓宽了历史视野,丰富了书写对象,不仅正面描写了解放区战场,也客观描摹了国统区战场,不仅塑造了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日英雄形象,也讲述了国民党抗日部队英雄官兵的故事,力求还原整个抗战历史的战场生态和面貌。

改革开放以来的抗战文学之所以取得如此进步,一方面得益于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改革开放和综合国力的提升,尘封的历史资料被发掘整理,特别是战争亲历者口述历史和回忆录的出版,为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广阔的空间;另一方面,得益于作家们敢于吸收和借鉴历史、科学、时政等领域的研究成果,勇于在创作方法、表现手法、主题内容上不断探索和创新。

从虚构类作品尤其是小说的创作上来说,既有宏大叙事也有微观书写,既有全景扫描也有局部再现,既有阳春白雪也有下里巴人,洋洋大观,异彩纷呈。比如,周而复的《长城万里图》、王火的《战争和人》、张廷竹的《中国无被俘空军》、莫言的《红高粱》、都梁的《亮剑》、徐贵祥的《历史的天空》、张卫明的《城门》、刘震云的《温故1942》、朱秀海的《音乐会》、阎欣宁的《中国爹娘》、黄国荣的《极地天使》、石钟山的《遍地鬼子》、靳大鹰的《385高地》、尤凤伟的《生存》、张者的《零炮楼》、常芳的《第五战区》、何倾的《永生再见》、海的《回家》、王霞的《打回老家去》、范稳的《吾血吾土》、徐纪周的《永不磨灭的番号》、周慧的《母亲行动》、韩丽敏的《七九河开》,等等,使得抗战题材的历史认知、战争艺术、人物范围、文化场景、文学界限等都得到了有益的拓展,使得抗日战争的历史更加丰满、可信、宽阔。值得一提的是,儿童文学作家在抗战题材上也作出了可贵的努力,比如曹文轩的《火印》、史雷的《将军胡同》。以长篇小说为主体的虚构类抗战文学作品,作家们的创作已经摆脱甚至拒绝了脸谱化、漫画化、公式化的倾向,更加注重从人性的角度对战争进行思考和审视,或讲述战争和英雄的传奇,或构建震撼人心的故事,或展现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实现了“跳出战争写战争”,展现了中国作家和中国文学的丰富的创造力和卓越的智慧。

在散文和诗歌创作方面,抗战文学也取得了不俗的成就。散文方面以铁凝的《猜想并上靖的笔记本》、老舍的《头颅

作花——英雄挽歌》、铁竹伟的《新婚夜》、何满子的《追忆沈星海——纪念他逝世六十周年》、韩小蕙的《火与剑,还是康乃馨?》、赵玫的《折一根竹枝看下午的日影》等为代表的一大批作家作品,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诗歌则以王久辛的《狂雪》为代表的一大批军旅作家的抗战文学作品,成为第一方阵,周涛、程步涛、李松涛、马合省、简宁、马萧萧等老中青作家成为中坚力量。

从非虚构类作品尤其是报告文学的创作上来说,抗战文学可谓硕果累累,蔚为大观,成为最为集中、最为全面、最为整齐、最有规模的重大题材类型创作,深受社会各界的认可和赞赏。在这些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王树增的《抗日战争》、何建明的《南京大屠杀全纪实》、彭荆风的《旌旗万里:中国远征军在缅甸》、徐锦泉的《台儿庄涅槃》、李延国和李庆华的《根据地》、铁流的《一个村庄的抗战血书》、纪建德的《不朽残碑》、孙晶岩的《北平硝烟》、张雅文的《与魔鬼博弈:留给未来的思考》、章剑华的《承载》、程雪莉的《寻找平山团》、高艳国和赵方新的《中国老兵灵魂曲》、谢维衡的《草民的抗战》、杨牧原的《我的爷爷是英雄》、杨义堂的《抗战救护队》,以及余戈的

“滇西抗战三部曲”等等。其中,王树增的《抗日战争》三卷本180万字,秉持了自觉的“全民族抗战”叙事,超越了以往关于抗战叙事中常见的意识形态先行、基于单一视角叙事的规制,使作品更接近历史的真实,更真实地存录历史的本真,有评论家认为“是一种旨归于当下和未来的精神性写作,其重大的价值在于对凝聚在抗日救亡运动中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的激活”。丁晓平的《另一半二战史:1945·大国博弈》则独辟蹊径,从世界政治与战争的关系的独特视角,“站在宏阔的高处来观察历史,以天花板式的视角来进行顶层的叙事,从而成就了这部视野开阔、立体简洁、收放自如的大书”,完成了二战历史的超越叙事,填补了中国抗战文学的空白。总之,抗战题材的报告文学创作,作家们以难忘的体力、心力、定力,“不仅呈现出数量上的规模化扩张,更显示出新的叙述通道和质的提升”,展现了更有希望更具生机的活力和未来。

抗战文学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潮流中,勇于开拓,不断创新,创作的艺术性、客观性、文献性在历史纵深感、穿越感、历史感上都取得了重大突破,从宏大叙事到微观叙事,从英雄人物到平民百姓。从正面运动作战到敌后游击战,题材的广阔、人物的丰富、情感的把控,无论数量和质量都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但不可否认,改革开放以来,从世界文学创作的视角来说,当代中国作家对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的文学表达和记录,至今仍然鲜有优秀的作品能够与世界反法西斯文学相媲美,难以与这场伟大的战争所带给中华民族的苦难和中国人民所做出的牺牲相适应。这既是中国作家十分惭愧的,又是需要更加努力的,未来也依然存在巨大的空间和极大的可能。

如何把抗战文学所蕴藏的底气、彰显的骨气、升腾的勇气、张扬的正气更加丰美、丰富地展现出来,如何把伟大的抗战精神进行时代化书写,这是当代作家面临的机遇和挑战。针对抗战文学创作存在的困境和问题,我们必须认真的回顾、总结和反思。笔者认为抗战文学在创作上必须处理好如下三个关系。

一是要处理好大与小的关系,呼唤宏大叙事,提升“思想

力”。个体的历史越来越清晰,整体的历史却越来越混沌。历史的“碎片化”和“碎片化”的历史,已经说明个体、个性化甚至个人主义的微观史终究不能承担“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历史责任和使命,更无法克服其自身致命的弱点——没有足够的能力来理解和诠释世界上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重大转变。对重大问题的失语和无力,是微观史所面临的巨大挑战。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文学是一种思想的艺术。因此,抗战文学离不开宏大叙事,要有世界眼光,必须实事求是地回到历史现场和历史语境当中,把中国的抗日战争纳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视域内,完整书写整体的历史和历史的整体,在宽容、坦率、真实、正义中正视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和历史问题的深度价值和潜在秘密,循着实事求是和辩证唯物主义的逻辑,在常识中把握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

二是要处理好敌与我的关系,尊重历史规律,提升“想象力”。尊重历史的规律,也就是要符合历史的潮流。历史的发展是有其内在的逻辑的。优秀的历史文学书写者必须兼备思想家的高度、历史学家的深度、文学家的热情和新闻记者的敏锐度,说白了就是要求你用文学艺术的手法——历史的想象力,把历史事实中最有情感价值和智识价值的部分呈现给普通大众,或者说把最有价值的那部分历史传递给读者。何为最有价值的历史?就是推动民族、国家和社会不断发展进步,有利于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那部分历史,就是给人力量、希望、温暖和美好向往的那部分历史。尊重敌人就是对自己最大的尊重。比如侵华日军也曾厚葬赵尚志、张自忠等抗日英雄。这是真实的历史,反映在文学作品中就是人性的表达。

三是要处理好文与史的关系,抵制虚无主义,提升“历史感”。肉体的虚无将导致精神的毁灭,历史的虚无将导致现实的毁灭。中国有文史不分家的传统。史学家写史,重实不重文;文学家写史,重文不重实。抗战文学应该追求文学和史学的统一,达到文史兼修。近年来的抗日“神剧”消费历史、搞历史虚无主义,把敌人写成愚昧无知的傻瓜,出现了娱乐化倾向,不仅失去了历史的真实,也丧失了文学的兴味,成为庸俗、低俗、媚俗的低级趣味,必须旗帜鲜明地坚决反对和抵制。

沉舟侧畔千帆过,铁马金戈正乾坤。“把历史变为我们自己的,我们遂从历史进入永恒。”我们有理由相信,热爱和平的中华民族有责任、有能力、有信心创作出属于自己的优秀抗战文学作品,在文学领域形成并掌握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的话语权。

## 生命的圆

□杨陈婧婕

圆周率是没有止境的。我看着白纸上的一圈圆,光滑,端正,呈现几何最美的图案。圆很奇妙,它的起点即是它的终点。而其中永无止境的π,却无法在圆中找到它的位置。

圆在纸上一直圈地循环,将自己绕成了一个有尽的结,而不是无限延伸的直线。

或许,人生也是这样。一个念头从我的脑海之中无声地闪过去,却烙下了一个永久的伤痕。人将自己的一生打成了结,从哪里开始,就从哪里结束。人一生所追求到的,终会在生命终结时化为乌有。原来兜兜转转地奔赴人生,不过是在走一个圆。

爷爷去世了,被永远留在了那个结里面,任谁也解不开。我站在外头,爷爷在里头,几米之远,阴阳两隔。我是很悲痛的,这恐怕就是生命的痛苦,接受一个人的辞别,最后也将自己送走,还无法与人团聚。生命是一个圆,一个空心的圆,躺在纸上,苍白,不充实。

爷爷悄无声息地走完了一个圆,那个π也悄无声息地、无休止地向前。我想,生命中也会有些事物,来扮演π这个角色。

灰色的楼道里,我收拾着爷爷留下的盆栽。花盆摆在楼道里,因为阳光不常来,似乎也被抹上了灰色,可能遗物都是这样的。我走过去,弯下腰,稳稳地抱起一盆花。这时我觉得双眼有些酸痛了,双颊也温热起来。我看见盆中纤弱的花儿,正纤弱地开放。这阴暗的楼道,好似被抹上了一小笔亮红。

悠悠地打进来,落在我脸上。

我将这盆花挪到窗口,让它更好地开放。

我继续在这人生的圆上行走着。我听见远方孤坟处传来的哀泣,冷雨滴滴答答地打在石阶上,我看见一个人在树下哀叹,桌上还有书如青山乱叠。总有什么东西压在心上。可能不是我们去走那个圆,而是那个圆从我们身上走过去。

我无声地看着冷雨打着窗头的花,花无声地看着我。我发现爷爷那盆花又抽出了嫩叶,奋力地爬出窗头,要看更广大的世界。

我发现雨落石阶的滴答声,似乎和肖邦的音乐一样耐听。那坟头的青草,舒适地生长着。又有几只鸟从我的窗头飞过去了,啼叫声散入风中,远远淌过耳边。

可能无人将这些美好一一捕获,这不必叹惋。我们在圆上找不到π,但π还是存在的,并且无休止地向前。好的,那么,抛开烦心事,你会听见花开的声音,那是死亡带不走的。

生命爬满了虱子,但也是一袭华美的袍。



# 「十七年」抗战小说创作再探析

□陈颖

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是20世纪中国反侵略战争最重大的胜利之一,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重要事件之一。中国人民经过14年艰苦卓绝的奋战和重大牺牲,迎来了和平的曙光。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自鸦片战争以来近现代中国一百多年大规模的战争动荡岁月基本结束。但战争犹如一列长途急驰的列车,虽缓缓停下,其驶过的轨迹却在民众心中刻下太深刻的烙印,以至新中国成立初期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人们的战争记忆总是难以抹去,战争文学创作更是火热朝天,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十七年”文学创作的主潮之一,也是20世纪中国战争小说创作成果最丰盛的时期之一。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相对于此前战争时期创作的寂寥状况而言,新中国成立初期“十七年”是20世纪中国反侵略战争小说创作成果最丰硕的时期之一,但如果从国际横向比较视野,从相关题材小说创作的广度和深度方面考量,这一时期的抗战小说创作还没有达到足够繁荣。首先,从横向比较看,同样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主战场之一,同样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战后苏联的战争小说在数量上远超前时期的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出版了近两千万种战争题材的作品,即以每年500部,每周10部的速度不断增加着”,其中不乏《一个人的战争》(肖洛霍夫著)、《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瓦西里耶夫著)、《一寸土》(巴克兰诺夫著)这样具有世界影响的优秀战争小说;其次,从抗战小说创作的广度和深度看,规模浩大、英勇卓绝、牺牲空前的全民族抗战在中国作家笔下凸显的仅仅是以华北为中心的规模有限地域有限的敌后游击战争,那些正面战场上千军万马的艰苦奋战、那些远征缅甸的中国官兵洒在异乡的热血、那些为争取国际援助而在异域他乡奔走呼号的人们……全无踪影。更不用说,涂炭生灵的残酷战争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作家笔下常常浅层次单维度地被谱写成战争的颂歌。虽说客观的历史允许作家作主观的文学表现,但历史与历史文学从来不可画等号,我们需要对新中国初期抗战小说创作的主客观氛围进行全面客观的分析。

### 文艺方针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向来重视意识形态工作,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动员贫苦群众反抗阶级压迫投身革命战争,是红军时期共产党理论宣传的重中之重。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抗日武装得以合法生存,但其活动的范围却受限于西北的陕甘宁边区、华北的晋冀鲁豫边区、华东的苏北皖南地区以及东北的部分区域,即便在如此分散的地域,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政策主张、军事战略等仍能得到较好贯彻执行,足见共产党在意识形态上的强大凝聚力和宣传机器的强大威力。国民党虽然是领导抗战正面战场的主导力量,但远不如共产党那样重视意识形态及宣传方面的工作。在延安抗日根据地,毛泽东亲自发动整风运动,对文艺发展的方向进行了严格规划,1942年在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毛泽东对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作出了明确规定,文艺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革命文

艺是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是齿轮和螺丝钉”;“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等等,并把从事宣传文艺工作的知识分子视为以笔为武器的部队,把他们与拿枪的军队相提并论,在战争年代,政党及其领袖对文艺作这样的规定在情理之中,因为战时的最大政治就是战争,要求文艺为抗击外敌入侵的战争服务乃天经地义。然而,随着战争的结束,和平时期的到来,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生活纷至沓来,文艺的天地理应变得越来越宽广。1956年至1958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曾经成为文艺发展的指导方针,文艺思想的一度活跃催生了文学创作的一度繁荣,新中国成立初期“十七年”有影响的战争小说作品就绝大部分问世于20世纪50年代的中后期,其中属于抗战题材的小说就有《铁道游击队》(1954)、《风云初记》(1954)、《烈火金刚》(1957)、《白洋淀记事》(1958)、《敌后武工队》(1958)、《战斗的青春》(1958)、《苦菜花》(1958)、《野火春风斗古城》(1958)等。然而,随着文艺界开展的一系列政治批判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文学为政治服务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自然,抗战小说创作也就基本偃旗息鼓,难有优秀作品问世了。

### 作家的经历与文学视野

作家的生活经历对文学创作具有根本性影响,这是毋庸置疑的,以当代战争历史为题材的小说创作尤是。综观新中国初期的战争小说,主要包括抗日战争题材和解放战争题材两大类,而这两类题材所反映的战争历史都近在咫尺,多数作家也都是战争的亲历者。亲历战争的人写战争,优长与短板并在。优长自无须多言。这里所谓的亲历战争并非都要穿上军装亲临火线参加过具体战斗,而是经历过、目睹过战争生活,至少是从战争年代走来。新中国成立初期“十七年”的抗战小说几无例外均出自亲历战争的作家之手,这些作家有的曾是军队中的一名战斗员,如《敌后武工队》的作者冯志、《烈火金刚》的作者刘流、《野火春风斗古城》的作者李英儒等;有的虽然不是战斗部队的成员,但长期从事抗日根据地的新闻宣传、文艺创作等工作,对战争生活十分熟悉,如《风云初记》《白洋淀记事》的作者孙犁、《铁道游击队》的作者刘知侠、《战斗的青春》的作者雪克等;丰富的战争生活素材是驱动作家创作的原动力,但战时动荡的生活难以提供潜心创作的条件,一旦国家社会具备了和平安宁的环境,蛰伏于心底的创作冲动就会喷涌而出,冯志说:“我所以写《敌后武工队》这部小说,是因为这部小说里的人物和故事,日日夜夜地冲击着我的心;我的心被冲击得时时翻滚,刻刻沸腾。我总觉得如不写出来,在战友面前似乎欠点什么,在祖国面前仿佛还有什么责任没尽到,因此,心里时常内疚,不得平静!”“十七年”时期的多数战争小说作者都发表过类似冯志这样的创作感言。人类近现代史上,每一场较大规模的战争结束,就会有数量不菲的战争文学作品问世,第二次世界大战落幕,苏联、美国、英法等欧洲国家都涌现了大量优秀的战争小说。相对而言,中国抗日战争结束后,无论在大陆

还是台湾,相关题材的战争小说创作在数量和质量上都难与苏、美、欧相提并论,究其原因,有主客观多方面的因素,客观方面的原因前已述及,主观方面的原因乃在于多数作家文学视野的狭窄。如前所述,新中国成立初期“十七年”抗战小说的作者绝大部分是有一定文化修养的军人或战地记者、文艺工作者等,但除了孙犁等职业作家具有较高的文学素养外,许多普通作者并未接受过系统的文学创作训练,有的甚至只是粗通文墨而已,因此,靠一部小说一炮打响的并非个案。对于战争的认识,这些作家多停留于对政治的、历史的、道德的、军事的浅层认识,在哲学、人道、美学方面也未深入,也因此,对于战争的表现,无不从政治立场、道德评判、军事技艺等层面加以文学演绎。这部分作品的缺点在于题材上均集中于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争;人物塑造上,善恶分明、性格单一、形象扁平;故事情节构筑上,以英雄的传奇故事吸引读者,具有浓厚的民间文学色彩。虽然有着写作能力上的遗憾,这种平面歌颂战争的小说作品还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得到众多工农读者的喜爱,这具有政治和文化两方面的原因:在政治上,由于共产党解放了全中国,人们对于新生的共和国充满着期待,并持续沉浸于战争胜利的欢乐氛围中,此时此刻正需要一批能够满足人们对于刚刚消逝的战争岁月的回味和猎奇,并能激发起国人斗志的小说作品;在文化上,以《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为代表的中国古代英雄传奇小说植根于深厚的民间文化土壤,向被中国民众所津津乐道,借鉴中国传统英雄传奇小说的艺术养分构建战争传奇英雄,是抗战小说博得时人青睐的奥秘所在。因此,从根本上说,新中国成立初期“十七年”抗战小说的成就与局限都是时代的必然。

70多年后的今天,随着岁月的流逝,抗日战争离我们越来越远,使我们能够站在新的历史高度上审视这场战争,认识这场战争,并有可能更加客观、理性和多角度、多层次表现这场战争,这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所不可能具备的条件。新时期以来,抗战文艺创作突破了既往陈旧的思维定势,涌现了一批思想性和艺术性俱佳的优秀作品,但也无可讳言,前些年在西方各种文化思潮精英杂糅泥沙俱涌的影响下,抗战文艺创作中出现了解构崇高、歪曲历史的胡编乱造现象,尤其在抗战题材的影视作品中,充斥着大量“抗日神剧”之类的戏谑之作,不仅降低了抗战文艺作品的精神与艺术品格,而且对于青少年一代正确了解抗战历史产生误导。回顾新中国成立初期“十七年”抗战小说创作的成败得失,笔者认为,当前抗战文艺创作应该坚守以下原则:一是坚持实事求是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精髓,对于抗战历史应尊重事实给予客观全面的反映;二是以严肃认真的态度、严谨求实的作风灌注于抗战题材的文艺创作,决不能为了片面追求阅读率、收视率 and 票房利润等,迎合低级趣味,胡编乱造制造噱头;三是既不一味追随西方错误文艺思潮,又不盲目拒斥西方先进思想文化,在借鉴吸收现代主义等优良艺术方法的基础上,努力创作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又为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所理解所喜爱的抗战文艺精品。